



刘海峰 主 编
李木洲 副主编

鉴古知今

的教育史研究

——第六届『两岸四地』教育史论坛文集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
全国百佳



刘海峰 主 编
李木洲 副主编

鉴古知今 的教育史研究

——第六届『两岸四地』教育史论坛文集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鉴古知今的教育史研究:第六届“两岸四地”教育史论坛文集/刘海峰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615-5272-8

I. ①鉴… II. ①刘… III. ①教育史—中国—文集 IV. ①G5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6269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总 编 办 电 话:0592-2182177 传 真:0592-2181253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 真:0592-2181365

网址:<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36 插页:2

字数:750 千字

定价:9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鉴古知今的教育史研究：第六届“两岸四地”教育史论坛

暨南大学
2013.11.16-18



教育史是教育理论的源泉(代序)

——在第六届“两岸四地”教育史论坛上的开幕致辞

潘懋元*

各位领导、各位学者：

第六届“两岸四地”教育史论坛的重点是讨论高等教育史，从高等教育史揭示的规律上鉴古知今。

在厦门大学召开高等教育史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这是第二次。18年前的1994年10月12—14日，当时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刚成立不久，就同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第一次高等教育史会议。为什么研究高等教育理论的组织与机构，如此重视教育史研究呢？这不仅因为教育史是教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因为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理论的重要源泉。

教育理论的源泉有三条：第一条就是教育史的研究；第二条是比较教育研究；第三条是现实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高。理论来源于实践，教育史是研究过去的实践，比较教育是研究外国的实践，但是还要结合现实的实践。今天比较成熟的教育理论，可以说都是从教育史或比较教育的研究中获得，并经过现实的教育实践的检验而被确认的。许多教学原则，可以从中国或外国的教育史上找到其根源。例如，学生的主体性，早已存在于自然主义的教育思想中；师生互动原则，早已存在于中国传统的“教学相长”之中。但是，由于社会文明不够发达或社会制度的局限性，使得不如今天所理解的深透。因此，需要从今天对这些教学原则所理解的深度和高度来评价教育史上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的价值。也就是说，教育理论与教育史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论从史出”，另一方面，“以论论史”，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当初，高等教育学科刚建立时，许多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理解，都要从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中得到：高等教育是在什么时代、什么条件下产生的？中世纪

* 作者简介：潘懋元，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大学如何发展为现代大学?高等教育的功能和高等学校的职能是如何演变的?人文主义同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矛盾斗争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意义?有的通过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已基本弄清楚,有的仍需要教育史的研究来进一步明确。例如,大学生的素质教育究竟是人文素质教育还是文化素质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成就是不是由于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发展”而取得的?高等学校去行政化,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应当提倡“教授治校”还是“教授治学”的理念?如此等等。

众所周知,历史与现实是不能割断的,研究现实的高等教育问题,差不多都要了解历史经验与教训,纵观其历史发展趋势。例如,要了解中国式的大规模统一考试如高考、国考,就要研究1000多年来科举制的演变和100年前的消失,即所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历史研究的生命力也存在于“鉴古知今”、“古为今用”中,而不仅仅是为古人唱挽歌,为逝去的岁月抒幽思,而是要启发人们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以免蹈历史复辙。特别是要注意对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有重要的意义:有许多所谓的新思想、新观念,乃是历史上旧思想、老观念换个新名词,旧瓶装新酒;有许多所谓改革、创新,实际上过去已有失败的教训。弄清楚这些思想观念的来龙去脉,判断这些做法的成败得失,给予忠告,是教育史研究者应尽的责任。

今天,我们内地、台湾、香港、澳门四地的教育史研究,实属同源异流。如果不知道民国时期的教育,就很难弄清楚台湾教育的某些教育现象与教育制度。举例说,如果不研究历史上雷沛鸿教育思想及其所试验的广西学校教育制度,就很难理解台湾为什么把小学称为“国民小学”,把初中称为“国民中学”的丰富的、深刻的含义;如果不了解英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也很难说清楚香港高等教育的学制与现状;澳门的高等教育,受葡萄牙的影响不多,但同香港高等教育、内地高等教育,有许多交错复杂的关系;至于内地的高等教育,至今还有前苏联高等教育制度积极与消极的影响。鉴古知今,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相互促进。

谢谢!

目 录

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古为今用

-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传统的现代价值 张亚群 2
- 论中国古代书院与现代大学精神 王洪才 16
- 明代书院教育制度四记 邓洪波 26
- 清代书院“课试”的现代启示 林上洪 39
- 近代中国国立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综论 肖朗 49
- 拓展与提升大学社会教育效能
- 我国近代大学兼办社会教育的本土经验 王雷 68
- 组织的力量：近代大学生政治权力
- 的来源与动因分析（1927—1949） 刘训华 77
- 台湾教育史上私校技职大学教师角色转变之探究 林建志 黄茂荣 90

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洋为中用

- 大学校长与大学发展
- 历史的考察 贺国庆 104
- 试论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的奥秘
- 以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四所大学为例 单中惠 114

住宿学院的理念与功能:历史与发展	陈小红	125
欧克斯教育史学之探究	梁福镇	133
阿普尔批判教育研究视域中的教师角色分析	王璞	148
近代莱顿大学教师学术职业特点与启示	吴薇 熊晶晶	157
19 世纪美国公共学校教改的本土化与普鲁士化之辩证	彭焕胜	164
英国地方院校是如何走向世界的 ——英国城市学院初创时期的办学经验及启示	朱境人	177

科举考试史研究中的鉴古知今

科举兴起的价值反思	黄书光	188
科举评价中的社会归因偏差与矫正	李雄鹰	196
科举制:客家传统教育发展的助推器	滕文娟 熊贤君	204
科举制兴起的深层逻辑	李木洲	210
明清科举考生数与录取人数失衡问题的因应对策之分析	周愚文	220
科场人生:《儒林外史》之周进	田书清	250
《汉阳会馆题名匾录》的社会史价值	王日根	258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寄籍应试政策 ——关于流动人口“就地考试”规定的一种历史考察	刘希伟	272
清代殿试军事类策问探析	王晓勇	284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另一类解读 ——《朱峙三日记(1893—1919)》阅读札记	田正平	294
大规模高利害考试之负面后效 ——以科举、高考为例	郑若玲 陈为峰	308
1952: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高考	刘海峰	323
台湾的大学入学制度论述之发展: 公平性、机会选择、卓越性之探讨	李大伟 李建兴 胡茹萍 黄嘉莉	335

其他教育史专题研究

论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周洪宇	350
问题与对策:对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思考	中国昌	366
别样的历史叙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教育影像	毛毅静 丁钢	375
中国古代敬老教化的路径及内涵探析	赵国权	386
清代江南民间习业活动探析	蒋明宏 于书娟	396
《红楼梦》的家塾教育生活	于洋	408
清末广东:文化资本的更新与教育场域的回应	王建军	417
清末新政时期的军事教育改革评介	吴洪成 甘少杰	430
战前黄炎培的抗日救国活动	谢长法	441
戴季陶《日本论》对近代日本武士道文化心理的解析	杨晓	450
台湾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师资培育政策之 分析(1994—2011年)	阎自安 吴政达	463
刘铭传与番学堂	张耀宗	475
台湾九年一贯课程:时代背景与改革理念	张芬芬	487
抗日时期澳门教育的光辉一页	刘美冰	504
郭秉琦与早期澳门中德中学	陈志峰	529
澳门教育耆硕罗玉成的教育理念 ——教育是很有趣、很有灵气的工作	老志钧	537
《马礼逊教育会年度报告》的史料价值:以马礼逊学堂为例	张伟保	550
近30年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的初步回顾	白杰瑞	563
附 录 会议论文目录		565
编后记		570

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

古为今用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传统的现代价值

张亚群*

摘 要:通识教育传统是东西方文化教育演化所显现的一般特征,具有民族性、传承性和普遍性,对各自的文明传承传播产生深远影响。近代以来,两岸四地大学教育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加强通识教育是其共同发展趋势。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传统的内涵、特征、形态演变及其作用,借鉴和弘扬通识教育的优良传统,对于端正办学目标、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品质,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传统;价值

通识教育作为教育理念和实践既古老又年轻。说其古老,是因为它渊源久远,深深植根于东西方民族传统文化传统;说其年轻,则表现为与时因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盛行于当今各国大学教育。近代以来,内地、香港、澳门、台湾的大学教育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加强通识教育是其共同的发展趋势。台湾学者曾指出:“由于通识教育‘界’较为缺乏博厚高明、可大可久的理论,所以,横面移植国外理论或经验者,远多于纵面继承自己教育传统并创新课程者。”^①这种现象在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界也屡见不鲜。鉴此,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传统的内涵、特征、形态演变及其作用,对于推进大学通识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批准号:BAA100015)。作者简介:张亚群,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黄俊杰:《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自序。

一、中西通识教育传统的不同际遇

传统作为一种历史延续,既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也是人类文化变迁的重要特征。它包括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通识教育传统是东西方文化教育演化所显现的一般特征,具有民族性、传承性和普遍性。正如刘东教授所言:“反观全世界任何延续至今的正常的古代文明,也一定是以通识教育为先的。”^①中西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各具特色的大学通识教育传统,对各自的文明传承、传播产生深远影响。

先秦时期,中国创立“辟雍”、“泮宫”、“筹学”等传统高等教育机构及私学,形成以中华“元典”为载体,以诸子讲学为媒介的通识教育传统。其经典文本有《诗》、《书》、《礼》、《乐》、《易》、《春秋》、《道德经》等。儒家以“六经”为教材,传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礼记·大学》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庸》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阐明儒家通识教育的纲领、目标、内涵与方式方法。这种传统深刻影响后世教育。

两汉时期的通识教育形态,主要表现为“经学教育”。以太学为主要媒介,通过察举方式,传播儒家通识教育,形成读经入仕的传统。台湾学者黄坤锦认为,中国古代的太学所教的科目“四书五经”,“其实也和西方‘七艺’一样,没有一门科目是职业性的、具有操作性的,都是 Liberal Education——博雅教育”。^②隋唐而下,经学与科举结合,对儒家通识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产生重大影响。儒家经典从“九经”扩展到“十三经”,并形成“四书”;教育方法从注重启发、自学转向考试技能的训练。^③

宋代书院教育是儒家人格理想发展的产物,它推动了儒学转型及儒学文化传播。在著名学者主讲的书院中,注重人格教育,延续了儒家通识教育传统。比较教育学家许美德(Ruth Hayhoe)认为:“传统中国的书院,略为近似中世纪欧洲的大学”;“书院生动与非正式的教与学活动、丰富的藏书,以及广

① 刘东:《全球化时代通识教育的困境》,载《文汇报》2010年7月31日。

② 黄坤锦:《大学通识教育:心灵的攀登》,载《解放日报》2009年10月18日。

③ 张亚群:《科举制下通识教育传统的演变及其启示》,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4期。

阔的讲论的刺激,在中国是高等教育传统中第二条不绝如缕的命脉。”^①台湾学者也指出,书院“与西洋时代相同而年代略晚的现代大学的兴起相较,无论在制度、规模,以及教育内容等各方面,均足以相提并论,东西辉映”^②。书院制度及其教育活动所贯穿的教育精神,“一言以蔽之,即儒家人文精神与通识教育传统”^③。

西方通识教育传统渊源于古希腊文化。公元前8世纪问世的《荷马史诗》,成为当今欧美通识课程的最早经典。其后,毕达哥拉斯学派、智者学派分别传授算术、几何、天文学、音乐“四艺”及文法、修辞学、辩证法“三艺”,构成了古希腊学习哲学和雄辩术的基础学科。经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古罗马学者瓦罗等人的传承与发展,逐渐形成以“七艺”为基本科目的自由教育传统。中世纪大学称其为“七门自由学科”,构成学习神学、法学和医学等专业教育的预备和基础课程。^④

由于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因素影响,中西大学通识教育传统在演变过程、传播路径与影响范围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古代大学教育的三种主要形态——以太学、国子监为代表的官学,以选士为目标的科举以及阐释心性之学的书院制度,“在起源上有先后之分,在地位与作用上则处于交替与互补状态,最终形成以各级官学为主体、科举考试为重心、书院教学为补充的传统高等教育格局”^⑤。自隋唐时代始,随着国力强盛及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通识教育逐渐向东亚国家和地区辐射,传播到越南、朝鲜、日本等国,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大学教育传统的影响。

明清时期,在专制统治与文化禁锢政策的束缚下,中国大学教育的内容与形式陷入僵化状态,失去原有的活力。清代前期残酷的“文字狱”与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士人避谈时务,转向“考据”之学,中西文化交流停顿。晚清,在西方殖民扩张、西学东渐的冲击下,传统大学教育出现严重危机,儒学通识教育急速衰落。

相比之下,西方大学通识教育传统经历不同的演化路径,教育影响后来居上。中世纪大学承袭希腊罗马的教育传统,主要分布于西欧。进入近代,西方大学发生划时代变革,产生世界性的教育影响。一方面,西欧国家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推动通识教育传统变革;另一方面,

① [加拿大]许美德(Ruth Hayhoe):《中国的大学与西方学术的模式》,载伍振鹭主编:《亚洲大学的发展——从依赖到自主》,师大书苑1990年版,第42页。

② 伍振鹭:《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三民书局1982年版,第103页。

③ 张亚群:《东亚书院制度与书院精神》,载《台湾》《通识在线》2012年第45期。

④ 黄福涛主编:《外国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⑤ 张亚群:《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西方殖民者通过海外扩张,将自由教育传统传至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等地区。尤其是北美,成为西方大学通识教育传承的重镇。

台湾学者林孝信指出,19世纪中叶之前,英国大学确实实施通识教育,但是以培养贵族与社会精英所需要的那种内容。此后,在科学发展与学术研究的冲击下,“传统通识教育(或自由民教育)受到严厉的挑战。欧美大学,或是转向重研究轻教学的研究型大学,或是重视农工技职的实用教育,或是符合市场需要的多元自由选修教学”。他进而分析:“通识教育的重生来自解决社会内部分化的需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设西方文明的课程,以避免美国移民社会因欧战而分裂。美国从此取代欧洲国家,成为通识教育的领航者。而随着知识爆炸与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变迁,通识教育也在20世纪末再度受到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重视。”^①这一分析,既阐释了西方大学通识教育传统变革的社会根源与时代要求,也阐明大学通识教育演化的国际趋势。

二、近代大学制度移植与新传统的构建

在东西方文化地位变易的大背景下,近代以来,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中国大学教育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型,表现出浓郁的“西化”色彩。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 Philip G. Altbach 将近代西方教育冲击下亚洲高等教育的演变称为“扭曲的根”,把中国与日本、泰国的高等教育变革归为“非殖民的继承”。他指出:“这三个国家的大学制度,在其基本的组织模式上,主要仍是西方的,其事实是明显的。这些国家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极具重要性,不仅因为他们是重要的亚洲国家,并且也因为他们显示西方的影响如何在独立的条件下发展。”^②这一时期,通过移植西方教育制度,引入西学课程,融合本民族文化,中国大学逐渐构建新的通识教育传统。其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促进了大学宗旨、课程结构、培养模式及师资队伍变革与发展。

第一阶段,从清末大学章程的拟定,到民国初年《大学令》的颁布及北京大学的变革,初步确立了通识教育宗旨及通才教育模式。参与者主要是倡导教育变革的学者、留学毕业生、教育官员及大学校长,虽然人数不多,但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① 林孝信:《十九世纪英国高等教育的质变》,载《台湾》《通识在线》2011年第34期。

② [美国]Philip G. Altbach:《扭曲的根:西方对于亚洲高等教育冲击》,载伍振鹭主译:《亚洲大学的发展——从依赖到自主》,师大书苑1990年版,第15页。

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主张引入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课程,改善专门人才的知识结构。他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确定“中体西用”的办学宗旨,并列举两义:“一曰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①在课程结构上,规定京师大学堂分为“溥通学”和“专门学”两种,前者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学等十种,另加外语一门,均具有通识教育的性质;学生普通学毕业后,应习专门学一门或两门。其后,《钦定大学堂章程》确定大学宗旨为:“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学。”^②1906年、1907年,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先后举办本科教育。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共设7学科13学门,其中,“中学”4门,“西学”9门。这三所大学所实施的“溥通学”教学,成为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发端。

民国初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制定教育新宗旨,废除大学经学科。教育部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③确立以文理二科为主,培养“通才”的办学目标。及至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这一教育理念付诸实践。

就其大学理想之切合通识教育者而言,约有四端:一是认为大学乃“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不同思想学派并存,“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④二是“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学科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三是“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⑤四是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因为“美以普遍性之故”,“皆足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比较,则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固已足矣。”^⑥基于此,蔡元培在北大采取多项改革举措。

首先,循思想自由之原则,破除中学与西学、留洋与本土之樊篱,“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⑦为培养通才奠定了思想与学术基础。其次,“沟通文理,合为一科”,将当时北大文、理、法三科

① 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页。

②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③ 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页。

④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⑤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

⑥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⑦ 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页。

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在文、理科开设各学门的“通科”课程,本学门第一、二学年共同必修;辅以“特别演讲”,由各科学生自由听讲。第三,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实行“单位制”(即学分制),扩大教学的自主选择性。第四,推动美学教育,陶冶师生情操。如其所言,他“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①因美育教师匮乏,1921年他亲自为学生讲授美学十余次。第五,创办《北京大学月刊》,“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他亲撰《发刊词》,明确指出:“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狭隘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②这些举措不仅拓展北大通识教育的深度与广度,而且开创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新传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教育影响。

第二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新学制”的实施及“国学”教育的兴起,到30年代中期“学院制”的推广,更多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投身通识教育实践,促进教育模式变革,探索通识教育新路径。

从教育制度变革来看,1922年“新学制”以七项“标准”作为教育指导方针,允许设立单科大学,废止预科,采用选科制。这些举措,既增加大学办学的自主性与选择性,推动大学数量扩张,特别是私立大学的创办,也对大学基础课程产生冲击,导致办学质量下降。为了提升大学教育程度,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调整高等教育方针,规定:“大学暨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③7月颁布《大学组织法》,将大学分科改称学院,确立学院教育模式。在七科之外,增加教育学院;大学至少需具三个学院,且包含理学院或农工医各学院之一。其《大学规程》要求,大学各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须为未分系之一年级学生,规定基本课程;各科课程采用学分制,但有学年限制,不得提早毕业;按课程学术体系及办学条件,设置大学课程。1931年教育部公布学分制划一办法,通过整理大学课程,纠正课程泛滥凌乱、多修滥给的弊端,提升通识教育效应。

在通识教育内涵方面,继续汲取西学内容与教育方法,兼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形成以科学与人文教育为主导、融会中西文化的新传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学”教育的兴起。刘东教授指出:国学“是西学背景下对民族学术文化的总称;西学在经历现代化之后出现了严重分化,中国文化又在不断地西化中被外来范畴所割裂。作为对中国教育体系过于西化的反弹,‘国学’恰恰

①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

②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1页。

③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代表着中国通识教育本身。”^①20世纪20年代起,唐文治、蔡元培、胡适、曹云祥、吴宓、陈嘉庚、林文庆、刘廷芳、陈垣等人,先后创办或倡办了无锡国学专修馆(后称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培育国学研究人才,产生重要的教育影响。

在实践层面,继蔡元培之后,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等,融合中西文化,积极探索通识教育新路。郭秉文制定“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力求“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②创造性地借鉴美国大学教育模式。林文庆师承英国大学教育传统,制定厦门大学《校旨》:“本大学之主要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以研究一切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阐发中国固有学艺之美质,使之融会贯通,成为一种最新最完善之文化。”^③他强调:“厦门大学重视国文、文学、哲学及文科各课程之重要”;“文科学生亦应有相当之科学知识,以便完全实现其所受教育之功用也。”^④辅仁大学章程规定:“本大学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并注重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展中国固有文化。”^⑤陈垣在办学中,文理并举,博专结合,超越学科藩篱,培养出众多学贯中西的专门人才。

在师资结构上,这一时期留学毕业生成为公私立大学教师的主导力量,特别是大量留美、留欧毕业生学成归国,直接推动了西方通识教育理念的传播。如东南大学,“以留美毕业生为主体的师资结构,不仅充实了学校的教学、管理和科研力量,而且为引进美国大学模式铺平了道路。”^⑥30年代的南开大学,留美学生构成教师队伍的主体。“正是依靠了这批留学生的努力,南开大学在全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⑦

厦门大学在陈嘉庚先生的倾资支持下,广聘海外留学人才。1921—1924年新聘近50名教员中,有留学生26人,占其总数的52%以上,而留学美国者

① 刘东:《全球化时代通识教育的困境》,载《文汇报》2010年7月31日。

②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载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生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8~159页。

③ 《厦门大学布告》,厦门大学印刷所印,民国13至14年(1924—1925)第3卷第2期,第21~22页。

④ 林文庆:《文科之重要》,载《厦门大学文科半月刊》1928年第1期。

⑤ 孙邦华:《身等国宝 志存辅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⑥ 张亚群:《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⑦ 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页。